

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丛刊

(第一辑)

传抄
古文字编(上)

徐在国 编

线装书局

线装书局

徐在国
编

传抄古文字编（上）

序

2002年徐在国同志的《隶定古文疏证》一书出版时，人们便寄望他能出一部有关篆体古文的工具书以应学界的需求；想不到短短的两三年工夫，这部荦荦大观的《传抄古文字编》书稿便赫然出现在眼前，令人叹为观止！

传抄古文是指汉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先秦文字，王国维称它与出土的战国文字是「一家之眷属」。实际上传抄古文与出土战国文字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联系是指两者原本都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区别是指这些古文经过历代传抄转写而产生种种的变异，与出土的战国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传抄古文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特殊文字资料，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来源驳杂但精粗可分。从本书所收的十三种材料来看，传抄古文确有多头的来源，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源于汉人所传的孔子「壁中书」以及秘府所藏和民间所献的各种先秦写本，而以类似今天所见的楚竹书上的文字为最大宗，应是汉人所见的战国文字。魏晋及其以后的时期，中国文字已完全进入今文字的隶楷阶段，经典文献亦已基本定型，这时各种先秦写本的文献价值日趋式微，而其文字上的价值却因有别于今文字而往往令人刮目相看，于是用古文体书写的碑刻和古文一类的字书便应运而生，形成来源各别的异体共生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曾将《汗简》所收古文同出土材料相校，发现郭书征引的古文与出土材料相合，或虽存在差异，然符合自然之

流变者约占百分之四十；这一部分虽不及总数之半，但却是《汗简》书中最可靠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部分的古文不但有流传至今的《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和碧落碑文可资参证，而且有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可以印证，特别是那些早年所传而后世失佚的古文，每每见于当今出土的先秦文字，更加有力地证明它们确有来历，绝非杜撰。其次，郭书征引古文产生不同程度的讹变约占郭书古文的百分之三十五，然其中绝大多数形迹可寻，只有少数讹不成体者，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有的也有可能被释读出来。至于《汗简》古文改从郭氏部首及郭氏仿《说文》古文「以隶作古」这一部分，向为古文怀疑论者所诟病，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自觉排除郭氏个人掺和的成分，还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利用的。《汗简》古文所反映的这一现象，在传抄古文中极具代表性，值得细加分析。今天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传抄古文，就是要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二是形体奇诡而规律可寻。传抄古文形体产生讹变，是由「传抄」这一特性决定的。如前所述，汉人所传之文源于六国文字，而形体讹变本来就是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可以想象，当时流行的各类写本，从汉至宋历经一千余年，由写本变而为抄本，由简帛本变而为纸本、刻本，又由文本变而为字书，这中间经过无数人的转写和临摹。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到时代条件和书写者自身水平的限制，形体讹变是十分自然和普遍的现象，甚至于愈演愈烈，成为传抄古文的一大特色。前人称这种形体讹变的古文为「奇诡不经」，或干脆斥之为「好事者之所为」。这在战国文字出土甚少，人们对六国文字尚不理解的年代是不足为怪的。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各种品类的战国文字层出不穷，其中以出自楚地墓葬的简帛文献为最重要，尤以近年相继发现的一百多种原型古书为最具特色。根据这些材料，人们仿佛看到了传抄古文当初所据的底本，相信距离彻底解开传抄古文讹变之谜也不会太遥远了。实践证明，为了有效地揭示传抄古文讹变的规律，必须详细地占有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充分吸收简帛文献的研究成果，罗集大量相关的字形，理出形体递嬗演变的发展序列，抓住产生讹变的关键环节，揭示其形音义互相制约的特殊关系，顺藤摸瓜，使其无所遁形。值得注意的是，大凡古文中之奇诡讹异者，多半与声音通假

有关，只有因声以求其本字，再循本字之形以探其嬗变的轨迹，每每可以迎刃而解。几乎可以这么说，每种成功运用古文一系的材料以解决出土文献中某些难解之文与难通之义的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是值得好好学习和总结的。

在国同志奋发勤敏，学有渊源。他除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还执着于从事这类一般专家不屑为而非专家不能为的工作，为广大学人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本书取材宏富，甄选有方，体例完善，字形精准，是一部集大成的工具书。值此《传抄古文字编》付梓之际，在国同志要我写几句话弁首，因不揣浅陋，略陈鄙见如上，尚祈编者和读者有以教焉。

曾宪通

乙酉仲冬序于珠江南岸康乐园之晴翠居

前言

传抄古文是指汉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古文字（主要指战国文字）。我们认为传抄古文应分为篆体和隶定两部分。关于隶定「古文」，可参笔者《隶定「古文」疏证》^①一书。此不赘。本书所说「传抄古文」主要指前者。但《古文四声韵》中所录的隶定「古文」一并收录，特此说明。

关于传抄古文中的「古文」，许慎说「孔子壁中书也」。清末吴大澂、陈介祺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是周末文字的看法。^②王国维又断定所谓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裘锡圭先生说「这种古文（引者按：指《说文解字》和三体石经残石上的古文）其实就是简帛文字」^③。李学勤先生说：「〔汉代〕学者的知见主要是上面说的简书。这些书籍本为秦代遭禁的六国写本，用的是六国字体，因此汉代「古文」基本上是指这类字体而言。」^④「古文」所指已经十分清楚。至于「籀文」，学术界对其时代尚有争议，我们不想在此讨论。我们是将「籀文」也纳入「传抄古文」了。

传抄古文的资料十分庞杂，主要见于如下书籍及碑志中：

- ① 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② 转引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要》55 页，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56 页，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 ④ 李学勤：《汗简注释序》，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一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

东汉许慎著。许慎在《说文序》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古」指「古文」,「籀」指「籀文」,还收有少量「奇字」,「奇字」即「古文」而异者。本书只收《说文》明确标明「古文」、「籀文」、「奇字」者。

所用版本为:中华书局影印清陈昌治刻本。

二 石经古文

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以收录魏正始年间刊立的三体石经为主,又收有二体石经、一体石经,还有附录、补遗。^①孙书未收者有:

日本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经拓本之一、之二。^②

顾颉刚、顾廷龙辑《尚书文字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之《康诰》1761(原载《人文杂志》)、《梓材》1909(原载《人文杂志》)、《立政》2492(潘氏藏拓)、《立政》2500(顾氏藏拓)、《顾命》2688(顾氏藏拓)。

邢义田、陈昭容:《一方未见著录的魏三字石经残石——史语所藏〈尚书·多士〉残石简介》,《古今论衡》2, 1999年6月。

宋洪适《隶释》著录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③

施谢捷先生研究魏石经多年,著有《魏石经古文汇编》一书,摹写精良,正待出版。承谢捷先生慨然应允,准许我使用其资料。特此致谢!

① 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民国二十六年(1937)石印本。

② 邱德修:《魏石经初探》,学海出版社1978年。

③ 洪适:《隶释》,《隶续》310—311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三 碧落碑、阳华岩铭

碧落碑，唐咸亨元年（670）立，在绛州（今山西绛县）龙兴观，拓本有：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 古文四声韵》所附拓本；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著录的碧落碑拓本，采用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拓本，石未断，并有释文。^①

阳华岩铭，唐永泰二年（766）刻，在江华县（今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元结撰文，瞿令问书，刻于摩崖。前行序文为隶体，后三十五行铭文，仿魏三体石经体例，每字先古文，次小篆，再次隶书。^②

四 《汗简》

宋郭忠恕著。体例仿《说文》，按部首排列，分四卷。『书名取典古人所谓「杀青书简」，是用来标明古文渊源所自，说明古文是来源于古代用以「书简」的文字。』^③

所用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的冯舒本。^④

《汗简》征引的资料有七十余种，将当时他所见到的『古文』资料汇为一编，功莫大焉。尤其是已经亡佚的资料，更是弥足珍贵。

《汗简》一书向遭冷遇，其价值的真正被认识是在战国文字研究兴旺之时。学者已经多有研究，可参：

李零：《〈汗简 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⑤

- ① 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5—26页、15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 ② 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116—120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 ③ 李零：《〈汗简 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2页，中华书局1983年。
- ④ 李零：《〈汗简 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2页，中华书局1983年。
- ⑤ 李零：《〈汗简 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

黄锡全：《汗简注释》；^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二章。^②

五 《古文四声韵》

宋夏竦著。此书是在《汗简》基础上编撰而成，体例与《汗简》异。《古文四声韵》以声韵隶字，「准唐《切韵》分为四声，庶令后学易于检讨」。征引的材料比《汗简》多，有九十余种，收字丰富。

所用版本为：国图藏宋刻配抄本。附国图藏宋绍兴乙丑（二五）齐安郡学本的残卷。^③个别不清楚者，采用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罗振玉石印本。^④

关于《古文四声韵》的研究散见于相关文章中，较为集中的可参见：

李零：《〈汗简〉〈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

黄锡全：《汗简注释》；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二章；

许学仁：《古文四声韵古文研究·古文合证篇》。^⑤

六 三体阴符经

宋郭忠恕书写。用篆书、隶书、古文三体书写，其中篆书字大，隶书、古文分列左右，字小。此经刻在唐怀恽

① 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②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二章，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③ 李零：《〈汗简〉〈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中华书局 1983 年。

④ 夏竦：《古文四声韵》，罗振玉石印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采用罗振玉石印本的字有：蔡（籀）、崔（籀）、穰、咸、戴（籀）、霍、惠、胤、封、亓、喜、本（孝）、郭、齐（史、史）、氣（崔、说、说）、屢、驻、奄（义）、懼、齏、绝、纷、锡等。

⑤ 许学仁：《古文四声韵古文研究·古文合证篇》，文史哲出版社（待刊）。

禅师碑(又名「隆闡大法师怀恠碑」)碑阴,该碑现在在西安碑林。杨守敬《续寰宇访碑录》中著录,又收入《杨守敬全集》中。三体阴符经拓片承蒙李家浩先生惠赐复印件,特向李先生表示感谢!

七 《集篆古文韵海》

宋杜从古著。此书是在《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所收古文颇为庞杂。杜从古自序说:「今辄以所集钟鼎之文、周秦之刻,下及崔瑗、李阳冰笔意近古之字,句中正、郭忠恕碑记集古之文,有可取者,摭之不遗;犹以为未也,又爬罗《篇》、《韵》所载古文,详考其当,收之略尽。」^①也就是说除收传抄古文外,还收钟鼎之文,即铜器铭文。我们所收传抄古文本是不收铜器铭文的,但此书所录古文形体不注明出处,给我们的判定带来了困难。为保持此书原貌,我们未做改动,一并收录。所收的铜器铭文下文略有交代。

由于此书所录古文形体无出处,又没有好的整理本子,使用起来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易引以为证,当有所鉴别。我们在编纂字编时,发现该书存在以下问题:

(1) 该书部分字形下没有字头。

我们根据该字所在的韵部、字形结构,再结合《集韵》加以判定该字形体为何字。比如:

 (5·17 末韵) 字,缺字头。

此字应分析为从「刀」从「發」,隶定作「𠄎」。《集韵·末韵》:「𠄎、𠄎、𠄎……或省,亦从刀。」可知「𠄎」为「𠄎」字或体,则此字应为「𠄎」。

(2) 该书部分字写错了。比如:

3·36 𠄎 应为 𠄎

2·25 𠄎 应为 𠄎

2·25 𠄎 应为 𠄎

2·25 𠄎 应为 𠄎

^① 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宛委别藏》选集影旧抄本三册,1935年商务印书馆依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 | | | |
|------|------|------|------|
| 5·1 | 榭应为榭 | 4·16 | 穢应为穢 |
| 2·5 | 簪应为簪 | 2·3 | 損应为捐 |
| 2·29 | 蛾应为蛾 | 3·31 | 廛应为廛 |
| 5·10 | 璠应为璠 | 4·8 | 璆应为璆 |
| 2·7 | 鏹应为鏹 | 1·19 | 醇应为醇 |
| 4·32 | 淀应为淀 | 4·19 | 輶应为輶 |
| 4·31 | 黠应为黠 | 5·38 | 輶应为輶 |

这些错误我们都做了改正。

所用版本为：《宛委别藏》影旧抄本三册，1935年商务印书馆依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关于《集篆古文韵海》的研究，详参郭子直《记元刻古文〈老子〉碑兼评〈集篆古文韵海〉》一文。^①

八 宋古文砖

宋古文砖，1958年初出土于河南省方城县盐店庄村宋墓中，砖是铺在棺床上面，「据了解，砖约有三十余块，现仅存八块，砖的文字完全一样。」^②简报仅发表了一块砖的拓片，六行，每行十六个字，第三行缺一字。简报未发表释文。砖文字体是传抄古文，个别字不清晰，大多可释。详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75—76页。

九 宋志

宋故中山刘府君墓志，志盖用传抄古文书写共九字，文为「宋故中山刘君之墓铭」。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

① 郭子直：《记元刻古文〈老子〉碑兼评〈集篆古文韵海〉》，《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2001年。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75页。

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下册 1268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宋魏闲墓志，司马光书写，藏山西平陆县文化馆。志盖用传抄古文书写共十二字，文为「大宋故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详戴尊德《司马光撰魏闲墓志之研究》，《文物》1990 年第 12 期 83—85 页。

一〇 大嚮记碑

大嚮记碑，碑额用传抄古文书写，一行三字，文为「大嚮记」。从洪适释。详洪适《隶释》隶续 355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

一一 金志

金代虞寅墓志，1979 年出土于山东省高唐县。志盖用传抄古文（原文误为女真字，胡平生先生已辩之甚详）书写共十六字，文为「金故信武将军骑都尉致仕虞公墓志铭」。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省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 年第 1 期 49—51 页。胡平生《金代虞寅墓志的「古文」盖文》，《文物》1983 年第 7 期。王人聪《读金虞寅墓志盖铭书后》，《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七卷，1986 年。

除上述资料外，元、明、清三代均有传抄古文资料。具体如下：

- (一) 元代古文《老子》碑。
- (二) 元代杨钧《增广钟鼎篆韵》。
- (三) 元代杨桓《六书统》。
- (四) 明代丰道生《金石遗文》五卷。
- (五) 明代李登《摭古遗文》二卷，《补遗》一卷。
- (六) 明代释道泰《集钟鼎古文韵》五卷。
- (七) 明代田艺蘅《大明同文集举要》五十卷。

(8) 明代杨慎《六书索隐》。

(9) 明代不著撰者《篆韵》五卷。

(10) 明代闵齐伋《六书通》。

(11) 清代毕星海《六书通摭遗》。

(12) 清代林尚葵《广金石韵府》五卷。

(13) 清陈策《六书分类》十二卷。

上述资料中，(4)(5)所录古文形体未注明出处，与《集篆古文韵海》同，杂糅铜器铭文。其余诸书均注明出处。

元代以后的这些传抄古文资料，我们均已经按《说文》顺序排列剪贴好。但本书未收录，原因是：如果全部收录，篇幅太大。另外，这些传抄古文资料绝大多数渊自《说文》、《三体石经古文》及《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辗转抄写，没有多少新的古文资料。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未加收录。有关《老子》的传抄古文我们已经全部择出，编入《古老子文字编》中，读者可参看。

以上是传抄古文资料的著录情况。下面谈一下传抄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况。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 异体

传抄古文同一字下形体之间最常见的是异体关系。我们所说的「异体」是狭义的异体，即意义、读音完全相同，只是形体不同。有的是笔势不同，有的是形符不同，有的是声符不同，有的则是形符、声符均不同。例证就省略了。

二 通假

传抄古文同一字下形体之间比较常见的是通假关系。比如卷一中的通假字有：一与壹、祈与旂、禁与𠄎、三

与参、闾与闾、瓘与溲、璣与璆、理与俚、班与般、莊与妝、苓与霭、蕞与儂、荷与何、莛与炬、春与純、蘊与苑等。这些字均因为音同或音近而通假。

三 义同或义近

传抄古文同一字下形体之间有时存在义同或义近关系。比如：

祸字古文作「袂」(《古文四声韵》3·21引崔希裕纂古)。《玉篇》:「袂,古文殃。」《广雅·释言》:「殃,祸也。」《字汇》:「祸,殃也,害也,灾也。」祸、袂(殃)二字互训,当为同义关系。^①

气字古文作「氛」(《汗简》1·4引郭显卿字指,郑珍《汗简笺正》认为是「氛」字)。黄锡全先生说「此以氛为气乃义近互训」^②。其说可从。《说文》:「氛,祥气也。」气、氛也常常连言。二字属同义关系。

对字古文作「合」(答)(《汗简》6·83引王庶子碑,《古文四声韵》4·17同)。黄锡全先生说:「合古义同答(俗作答),与对字互训。……《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传「对,答也」。《仪礼·乡射礼》「既发则答君而俟」,注「答,对也」。^③二字互训,当为同义关系。」

馐字古文作「馐」(《集篆古文韵海》4·18)。《论语·乡党》:「食馐而馐,鱼馁而肉败,不食。」皇侃义疏:「馐,谓饮食经久而腐臭也;馐,谓经久而味恶也。」馐、馐均指食物腐臭,二字属同义关系。

兼字古文作「并」(《集篆古文韵海》2·29)。《说文》:「兼,并也。」二字当属同义关系。

见字古文作「省」(《集篆古文韵海》4·31第6形、第8形,4·32第2形)。《说文》:「见,视也。」「省,视也。」二字当属同义关系。

棚字古文作「窆」(《集篆古文韵海》4·44)。《说文》:「棚,丧葬下土也。从土朋声。《春秋传》曰:朝而棚。」

① 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黄锡全:《汗简注释》7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黄锡全:《汗简注释》50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礼》谓之封，《周官》谓之窆。《虞书》曰：‘窆，葬下棺也。’《说文》：‘窆，葬下棺也。从穴乏声。’《周礼》曰：‘及窆执斧。’‘窆’、‘窆’均指葬时下棺于土，二字当属同义关系。

四 错字

传抄古文中错字。产生错字的原因可能与辗转传抄发生讹错有关，也可能与传抄者误释某些古文有关。

如：

误【鸣】（《集篆古文韵海》3·25）为【禱】；

误【禭】（《集篆古文韵海》4·7）为【道】；

误【道】（《集篆古文韵海》3·8）为【辱】；

误【丧】（《集篆古文韵海》5·1）为【哭】；

误【闻】（《集篆古文韵海》4·23）为【爱】；

误【墉】（《集篆古文韵海》2·7）为【高】；

误【嗣】（《汗简》5·80引石经）为【副】等。

传抄古文中存在的这四种情况，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尤其是与出土的战国竹书情况一致。我们在相关文章中已经对有关问题做过分析。^①这也说明学者认为‘古文’出自战国简书的意见是正确的。

五 其他

传抄古文中还存在其他情况。如传抄古文中混杂有铜器铭文，像《集篆古文韵海》中的如下字：
召（4·34第1形不释，第2形疑是‘象’，第3形是‘省’）

^① 徐在国、黄德宽：《传抄〈老子〉古文辑说》，《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5—268页，2002年。

- 和(2·9第4形、第5形)
 鬲(5·31共11形)
 父(3·10共16形)
 对(4·21第1—11形、第13形、第15形)
 仆(5·1第3形是『夙』)
 敦(4·21第1—5形都是『簋』)
 争(2·17第1形或释『贯』)
 簋(3·5第1形是『须』、第2形不释)
 卣(3·33第2形、第3形均非『卣』)
 鬲(4·12第2形是『闻』)
 號(5·26共6形、第2形是『虎』)
 爵(5·22第3—5形)
 饗(2·2)
 射(4·38第1—5形、第7形、第9形)
 夏(3·28第1形、第5形均非『夏』、读『柔』)
 赖(4·18第2形、第3形)
 贯(4·29第2形、第3形均非『贯』)
 年(2·1第1—3形)
 穆(5·3共5形)
 宝(3·24第1形、第2形、第5—8形、第9形是『府』)
 溪(1·10应为『讯』)

- 寿(4·46第2—22形)
 屈(5·12第1形、第2形从「弓」从「巨」)
 豪(2·7第3形或释「覃」)
 易(5·29第2—8形)
 慧(4·16,铜器铭文习见,吴振武先生新近释为「浅」^①)
 惟(1·7)
 举(3·8所录5个形体均非「举」)
 彝(1·7共10形)
 金(2·27共12形,第8形非「金」)
 罇(4·21应为「铎」)
 斧(3·10第2形、第3形)
 万(4·26共22形,4·27前8形)
 乱(4·29前3形是「申」,第4形不释)
 癸(3·5第1形是「束」)
 子(3·6第1形多释「朋」,第2—4形非「子」,第13形多释「举」)
 午(3·12第1形、第2形、第5形)
 尊(1·19,第1—6形,其中第4形非「尊」)
- 上录诸字均源于铜器铭文,但许多字都被误释了。
- 此外,《集篆古文韵海》中还收有玉印文,如:「永」(3·31第13形、第14形)。还有鸟虫书,如「命」(4·42)

① 吴振武:《假设之上的假设》,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10月),又《吉林大学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